

名人自述

孙中山 吴玉章 徐特立 陈独秀 谢觉哉 林伯渠 董必武 朱德 刘伯承 毛泽东 宋庆龄 贺龙 王若飞 叶挺 李维汉 邓子恢 叶剑英 周恩来

杨里昂主编

革命名人自述

20世纪中国名人自述丛书



20世纪中国名人自述丛书

杨里昂主编

革命名人自述

花城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名人自述丛书

革命名人自述

杨里昂 主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狮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75 印张 1 插页 398,000 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2544-0
I·2187 定价:26.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言—— 中国心灵的圣殿：圣贤豪杰

◎孙洪涛

YINGXIANG ZHONGGUOWENHUA DE ERSHIDA SHENGXIANHAOJIE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博大精深、绚丽多姿的中国文化铸就了中华民族永生不灭的灵魂，使这个民族充满了灵气、生机与活力。

文化是民族的血统。

源远流长、承传不绝的中国文化世代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液中，升华为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使这个民族历经劫难而弥坚，牢牢地凝聚在一个大家庭中。

文化是民族的脉搏。

异彩纷呈、海纳百川的中国文化，伴随着波澜起伏的中国历史长河，不断吸纳营养，革故鼎新，创新再生，永葆青春活力。它记载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展现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轨迹和各个时期的风貌特征。

独具特色而又博采众长，承传不绝而又不断丰富创新，高远精妙而又不脱离人事——这就是独一无二、充满睿智的中国文化的品格。

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并不在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同祖同宗，而在于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精神家园和思维方式。

二

中国人崇拜圣贤，景仰豪杰。

圣贤豪杰是中国人心灵的圣殿和行为的楷模。

在中华大地上，从城镇到乡村，从南疆到北域，曾出现过许许多多的祠庙殿堂，用以祭奠圣贤豪杰。

然而，中国人所崇拜的圣贤豪杰并不是神，而是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学识渊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为民族、为人民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

中国人对圣贤豪杰的崇拜，并不是寻求精神的解脱，而是求得心灵的净化；并不是寻求超脱纷繁喧嚣的尘世，而是求得修身养性、建功立业的人生真谛；并不是谋求升入天堂的入场券，而是表达对先哲们人品功业的崇敬，并以他们为榜样，鞭策自己，激励时人，教育子孙后代。无疑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入世而轻出世、重人事而轻鬼神、重大义而轻私利的精神是相一致的。

中国人对圣贤豪杰的崇拜景仰，可谓源远流长，历经沧海桑田而不衰。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典籍中，此类字眼就屡屡出现。

先说圣：《易·乾·文言》曰：“圣人作而万物睹。”《老子》曰：“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书·洪范》曰：“聪作谋，睿作圣。”《论语·子罕》曰：“夫子圣者与？”至今，人们还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作用的地方称为“圣地”，把至纯至洁、高尚无瑕称为“圣洁”，把极其崇高而庄严的事物称为“神圣”等等。

再说贤：《书·大禹谟》曰：“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墨子·尚贤》曰：“列德而尚贤。”《庄子·德充符》曰：“久与贤人处则无过。”《荀子·王制》曰：“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谷梁传·文公六年》曰：“使贤者佐仁者。”至今，人们仍把有德才的人称为贤，如“选贤举能”、“任人惟贤”、“贤妻良母”、“贤哲”等等。

再说豪杰：《孟子·尽心上》曰：“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吕氏春秋·功名》曰：“人主贤则豪杰归之。”高诱注：“才过百人曰豪，千人曰杰。”今天，人们仍把“英雄”和“豪杰”并称连用。

以对圣贤豪杰的崇敬和仰慕为滥觞，经过历史长河的洗刷和悠长岁月的积淀，形成了一种具有显明特色的文化现象，我们不妨称之为“圣贤豪杰文化”。其内涵相当丰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中国传统文化高妙精深，魅力无穷，吸引着诸多中外学者不惜倾注毕生心血，来探求它的奥秘——成因、特质、精髓、蕴涵、变迁、价值及前途命运等等。

圣贤豪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阐释圣贤豪杰文化，对于解开传统文化之谜，是不可或缺的。

三

在中国民族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上，曾孕育出众多的圣贤

豪杰。

这些圣贤豪杰并非生来与众不同,而是时势造就的,是千万平民百姓波澜壮阔的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一展宏图的大舞台。然而,我们并不否认精英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独特的作用。相对于人民群众整体而言,他们是渺小的;相对于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体而言,他们又是伟大的。与常人相比,他们学习更勤奋,眼光更锐利,思维更敏捷,责任感更强烈,气魄更恢弘,人格更高尚;他们更善于从前人的思想和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获取智慧和力量;他们更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建功立业。当然,也不否认他们中的不少人具有超常的天资。

圣贤豪杰是民族文化和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乳汁哺育出来的精英群体。

反过来,他们又以自己的思想、人格、功业等等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和文化不断发展创新,并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精英人物不会凭空从天而降;没有精英人物的杰出贡献,也不会有高度繁荣的中国传统文化。

没有精英人物的历史是苍白的历史;

没有精英人物的文化是粗俗的文化;

没有精英人物的民族是缺乏灵气和创造力的民族!

圣贤豪杰,作为一个个历史人物,他们的生平业绩是那么血肉丰满、绚丽多姿;他们所承载的文化又是那么凝重厚实、蕴涵丰富!

在社会大舞台上,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在文化发展史上,他们是一串串文化符号;

在人们心中,他们是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四

何谓圣？

道德智能功业极高、泽被天下后世者谓之圣人。《孟子·尽心下》曰：“大而化之之谓圣。”东汉赵岐注：“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为圣人。”中国早期的典籍中，称圣者较为宽泛，如《孟子·万章下》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儒家典籍中多以泛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自儒家定于一尊以后，又特指孔子为圣人。孟子则被尊为亚圣，即仅次于孔子的圣人，赵岐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可见，孔子和孟子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公认的圣人：前者为至圣，后者为亚圣。

封建社会的帝王也被尊为圣。于是，臣民称之为圣上，他们的命令称为圣旨，他们的生日称为圣节等。然而，在历朝历代的帝王中，名实相符者少，名实不符者多。

人们还把一些学识或技能有极高成就的人称为圣。如兵圣孙武、书圣王羲之、诗圣杜甫、文圣欧阳修等等。

何谓贤？

德才并美者谓之贤。贤者的德才不及圣人，而又高出常人。贤的范围很广，凡有德有才者皆可称为贤。

何谓豪杰？

才能出众者谓之豪杰。贤人与豪杰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定的区别。两者在才能出众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前者更强调人品德行，后者更强调才干功业；前者突出出来的是心灵之美之善，后者突出出来的是气概之豪之壮。

在此，需说明三点：

其一,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圣贤豪杰,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从概念出发的,而是经过历史长河的披沙拣金,众所公认、约定俗成的。衡量他们的尺度,不在纸上,而在千百万民众的心中。

其二,圣贤豪杰们的文化价值,不是一下子就被人们所认识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被发现发掘出来的;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时段的。他们的思想、精神,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生生不息,世代承传,超越个体,凝聚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其三,虽然我们对圣、贤、豪杰的内涵作了界定,但实际区分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一是不同的认识主体对客体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二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三是历史人物本身具有复杂性、边缘性和不确定性。究竟孰为圣?孰为贤?孰为豪杰?有些是众所公认,很少异议;有些是既可称圣,亦可称贤;有些是称贤、称豪杰均无不可。本书在确定传主时,尽量尊重传统说法,体现历史性,同时也兼顾时代性,对今人的价值观予以必要的观照。

五

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许许多多圣贤豪杰。由于本书定位于“影响中国文化”这一主旨,所以,我们主要从文化的角度选取了有代表性的 20 位历史人物。力图通过对他们生平业绩、性格情操、思想观点等的介绍,活现出中国文化的绚丽多姿和独特风采,勾勒出中国文化传播演进、发展创新的基本脉络。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它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精神。

孔子是儒学的创立者和奠基人。他的学说体大思精,构成

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和灵魂，影响极为深远。他不仅是儒学的祖师，而且是古代中国的至圣先师和精神领袖。

孟子是儒学的嫡系传人。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思想，提出了性善说、仁政说、民本说等，对后世儒学的演变和发展有很大影响。孟子学说被视为孔门儒学的正宗，其地位仅次于孔子，故有“亚圣”之称。人们往往把孔子与孟子并称为孔孟。

董仲舒是汉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春秋战国时期，儒学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西汉中期，董仲舒以儒学为主体，兼纳各家之长，熔于一炉，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从此，儒学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这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儒学发展史上，韩愈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承前启后的思想家。在佛、道盛行泛滥的唐后期，他是一位捍卫儒学正统地位，反对佛、道的勇敢斗士。他高举尊儒反佛、道的大旗，正式建立起儒家“道统”说，开宋代道学之先声。韩愈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思想家。自宋代开始，儒学便以理学的面貌出现，这是儒学的一大发展和创新。朱熹承继二程（颢、颐）理气之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树起一个新的里程碑。朱熹所倡导的理学，被奉为儒学正宗，成为宋以后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

到明代，正当程朱理学风行于世之时，大思想家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宋人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理学。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学派的影响很大，还流行到日本。阳明学派以“反传统”

的姿态出现,是理学中的非正统派。它的异军突起,开思想界之新风,起到了打破禁锢、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

除儒学之外,先秦诸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本书选取了老子、孙武、韩非三位代表人物。

道家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仅次于儒学。老子李耳是道家学派的开山之祖,堪称为道圣。老子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构生、变化和本原,把中国古代的理性思维提高到空前的水平。老子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后来的各种哲学派别都从不同的角度吸取、阐发他的思想。道教则奉老子为教主,称“太上老君”。封建统治者曾封其为“太上玄元皇帝”、“混元上德皇帝”等称号。

孙武是兵家的鼻祖和代表人物,历来有“兵圣”之称。他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他的军事实践,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其所著《孙子兵法》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珍宝,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孙武的军事思想,充满睿智,超越时空,显示出永恒的魅力。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战国末年的韩非,集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之长,强调国君必须行法、执术、恃势,使法、术、势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一套系统的法治理论。韩非的学说和主张,适应历史发展之趋势,为建立与加强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韩非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很大。

中国古代史学源远流长,常盛不衰,成就斐然,举世无双。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仅次于经学。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穷毕生之精力,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后

世史家所宗所本。《史记》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是世界史学上不可多得的瑰宝，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以其伟大的人格、卓绝的成就赢得了“史圣”之称，也有人将其视为中国史学之父。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是诗国中最为辉煌的高峰，而杜甫则是挺立在峰巅之上的一位巨人。杜甫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诗歌创作。他的诗作，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时期的社会面貌，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达到了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因而，赢得了“诗圣”的崇高赞誉。

书法艺术是世界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棵奇葩，最具中国独特性。晋人王羲之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他博采众长，推陈出新，自成一家，故有“书圣”之称。其书备精诸体，尤擅正楷、行书，字势遒媚劲健，韵味浓重，对后世学书者影响极大。

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和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力排宋初靡丽、险怪的文风，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经过他的大力倡导和不懈努力，北宋古文运动取得丰硕成果，使风靡宋初的浮艳文风得以扫除，影响至为深远。他一生写了大量散文作品，形成平易晓畅、从容委婉的独特风格。其散文《醉翁亭记》等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成为传世佳作。欧阳修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并有“文圣”之称。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堪称一代名贤。他少孤贫而志存高远，常“以天下为己任”。他在《岳阳楼记》中，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明其志，这一千古绝句为世代所传诵。

包拯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他少有孝行，名闻乡里，为官以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敢于直谏、秉公执法、铁面无私、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而著称，受到历代人民的爱戴和颂

扬。北宋以来,包拯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百姓尊称其为“包公”、“包青天”。在中国人心目中,包拯是清官的代表,断案的神手,正义的化身,德才并美的典范,可谓贤中之贤。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他学问极为渊博,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无不研究,著述甚丰,史学成就尤大,所著《明儒学案》为中国第一部学案体史书,开浙东史学研究之新风。黄宗羲是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提出“工商皆本”论;激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倡导明经致用;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等等。与范仲淹、包拯等不同的是,黄宗羲只在南朝时短期任过官职,入清后再没出仕。因此,我们不妨称之为在野之贤、启蒙之贤。

魏源是清代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与龚自珍过从甚密,同为“通经致用”的代表人物,声望很高,世称龚魏。鸦片战争时,奔赴浙江前线,投身抗英斗争。后受林则徐嘱托,据《四洲志》等资料,编成《海国图志》。魏源生活在中国社会大转折的时期,面对强敌入侵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他敏锐地觉察到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大变动。他怀着满腔爱国激情,探求中国振兴图强、抵御外侮之路。为此,他积极主张研究了解外国情况,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先驱,他的思想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对推动近代中国社会改革和思想解放产生了积极影响,不愧是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界的一大贤哲。

封建帝王例被尊称为“圣上”,其实真正圣明者只是少数。本书选取了两位被公认为圣明的皇帝,即唐太宗李世民和清圣祖玄烨。

唐太宗是大唐帝国的第二位皇帝。他为唐朝的建立和统一建立了卓著功勋。称帝后,励精图治,广求贤能,虚己纳谏,安定

百姓，躬行节俭，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开创了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局面。“贞观之治”被后人视为治世的典范，唐太宗被历代奉为明君的代表和帝王效仿的榜样。

清圣祖玄烨，人们通常称为康熙帝。8岁即位，69岁去世。康熙帝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莫过于打击分裂割据势力和抗击外国侵略势力，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曾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出兵驱逐盘踞黑龙江流域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三次亲征，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又出兵平定藏族少数上层分子勾结准噶尔部叛乱，派兵分驻西藏，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康熙帝雄才大略，经文纬武，统治时期，号为“治平”，有“盛世”之称，史家称他“虽曰守成，实同开创”。就连坚不与清朝合作的黄宗羲，也誉称其为“圣天子”。特别是他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所建立的业绩，意义深远，功垂千古。

孙中山是近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打倒了清王朝，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后，为维护革命的成果，同反动势力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于1924年1月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关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伟大功绩，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精辟地指出：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

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上面将本书收取的 20 位历史人物的情况提纲挈领地一一作了介绍。

本书所收历史人物止于孙中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在这一艰苦、伟大、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曾涌现出许许多多英雄模范人物,造就了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和领袖人物。然而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圣贤豪杰有本质的区别,不应混为一谈。故本书所收历史人物只止于孙中山。

六

人类的脚步正匆匆向 21 世纪迈进。世界正在张开双臂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升起。

面对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世纪,中华民族正充满信心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中华儿女正在从事着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正在创造着历史奇迹。同时,也在进行着跨世纪的思考。

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必须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应该是少数文人学者的专利，而应该成为亿万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应该把着力点放在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上。

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跨世纪文化建设的正确战略选择。

60年前，伟人毛泽东就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②

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江泽民同志又强调：“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显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

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①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编写本书时,在尊重历史作品严肃性的同时,力求增强其生动性、可读性、普及性,使其成为具有一定品位的、可读性较强的、大众化的历史读物。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主观追求,客观上也许离这一目标有很大差距。

我们所希求的,是在跨世纪的文化思考中,以自己的弱薄之力,做一点有益的尝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潮中,加入一滴水。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采用和吸收了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些在文中已注明,也有的未在文中一一注出,还望诸位学者海涵。

由于本书出自多人之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文气不够一致,风格不够统一的问题。又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选取人物未必精当,在述事引文、人物评价等方面也会有疏漏欠妥甚至讹谬之处,欢迎读者不吝指正。

孙洪涛

1998年10月5日于河北大学寓所

^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